

批判右派分子 沈志远 吳承禧 在經濟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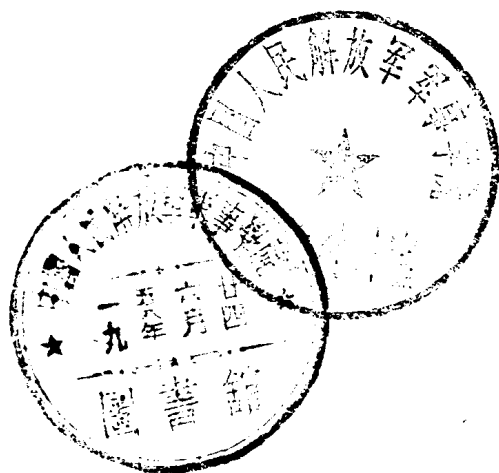
田 峯 江 陵 編 写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吳承禧 在經濟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

田 峯 江 陵 編 写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
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

田 峯 江 陵 編 写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2 13/16 字数 55,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統一書号： 4074·144

定 价：(7) 0.26 元

目 录

一	前言	1
二	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6
三	参預制訂及貫徹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科学綱領	18
四	对中国民族資产階級及其作用的反动观点	40
五	对战后美、英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修正主义謬論	54
六	反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工作	78

一 前 言

反右派斗争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不但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改变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新的上层建筑。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三类是主要的:第一种是从来就是反动的,他们不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对的,这是老右派;第二种是曾经赞成并积极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他们在口头上或理论上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在社会主义革命真的到来时,由于为建成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措施要触动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格格不入,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一切,从骨子里看不顺眼,最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面目,这就是“叶公好龙”之类的人物。他们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真的,是作为装饰品,作为猎取名位的手段。这三类右派分子,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都要和我们较量一番,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不

获全胜，决不罢休！事实上我們已經粉碎了他們的陰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战斗的过程中，我們体会到：在这三种右派分子中，以最后一种最易迷惑一部分群众，因为他们有进步的伪装、有画皮，因而不容易被揭发和識破。在被揭发以后，有的人将信将疑地說：“他不会吧？”有的群众說：“这是学术思想問題。”也有的人說：“他是好人，大概是由于政治經驗不足，偶然上了人家的当。”因而要彻底击潰他們，就要作更大的努力，就需要更多地摆事实，更深地講道理，画皮不剝掉，中山狼的真面目是識不破的。我現在要介紹两个著名的右派分子——沈志远、吳承禧，他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誰都知道沈志远是从来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全国著名的“經濟学家”，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介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天不少搞經濟科学的人，都讀过他編写的書。他贊成也参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解放以后，他以左派民主人士、老革命、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家的姿态参与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国家和人民給他以很高的荣誉，要他担任了許多重要工作。他曾經是全国和上海市的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的副主席、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上海市的主任委員，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員、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上海經濟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所长）、上海經濟学会主席、学术月刊編委会的召集人。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地右派分子，他是章罗联盟中的骨干分子，是他們的反动路綫在上海的忠实执行者，他参与了制訂和努力貫徹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綱領。当全国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期，他在上海各个方面指揮放火并带头放火。当时有人已經觉察

到：沈志远真的变了。因为那时从沈志远的身上，已嗅不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息，只觉得他滿身都沾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药味，一副温文尔雅的学者面孔，已变成了一副猙獰面目，同时也有人以猜疑的心情，注視着他的变化。但是，那时确有不少人受到他的迷惑，認為他从来是左派，他的态度和言論是代表党的，是在真誠地帮助党整风的，因而在他的影响下，特別是一些民盟的盟員，在各方面傳播了他的言論，到处放火。他們感到：連沈志远这个一貫“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拥护党和政府”的人物，都在公开地謾罵社会主义，詛咒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党的領導，丑化党員和老干部，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肯定的說：“党是不行了，社会主义要不得，人民民主专政有問題”。在1957年的春天里，确实一度“飞沙走石，月色无光”，使看不清形勢的人們不禁有变天之感。正因为如此，沈志远这个右派分子言論的影响，比一般右派分子就要大得多，因而他的罪孽也就更見其深重了。在批判与揭发沈志远的同时，我們就会連帶提到另一右派分子，这就是与沈志远穿連襪褲的吳承禧，他虽然长时期在浙江兴业銀行担任着資方代理人的职务，但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他也是一个“經濟学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經同情与参加了革命；在解放前夕，还到过解放区，而以老干部的身分参加了上海接管工作。七八年来，他在上海成为一个知名的民主人士，曾担任上海市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常委、上海市民盟的高教委员会的主任委員、上海財經学院的教务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委員、上海經濟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副所长）、上海經濟学会常务理事、学术月刊常务編委等职务。尽管他没

有讀过資本論，他也自命为馬列主义經濟学家，人們也就这样相信他。当 1956 年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吸收入党的时期，他也混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預备黨員，但他終究不能是一个忠实的共產黨員，而是一个“沈記”盟員。君不見：什么地方有沈志远，什么地方就有吳承禧，沈是民盟市主委，吳是民盟高教委員會主委；沈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員會筹备委員會副主委，吳是委員；沈是經濟学会主席，吳是常务理事；沈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吳是常委，兩人都是上海市人民代表；沈是学术月刊編委召集人，吳是常务編委；沈是上海經濟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吳是副主任；沈搬进十八层楼，吳也搬进去，他們同进同出，如影之随形，这絕不是偶然的。事实証明，他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言語和行动，他們是同一种人。所以在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时期，他們表演着同一脚色，吳承禧成为沈志远的重要的参謀和助手，在民盟，在上海經濟研究所，在高教部門，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上，在上海經濟学会，在学术月刊編委会，甚至携手联袂、仆仆京沪道上，以及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他們以同样的揮发油和燃料，共同放起一把野火，終于暴露了他們都是共产党的叛徒的真實面目。他們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方面，虽有程度上的不同，但他們有共同的思想体系，特別是在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濟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对待工农和老干部的态度方面，对待党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方面，对待战后的美英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看法方面，以及对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特点和作用等方面，他們是异口同声，唱的同一調子。同时在这次对党的进攻方面，他們都是披着馬克思列

宁主义外表,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贩卖資本主义的私貨;他們依靠的力量和据点,除了民盟而外,又都是以高教科学界为根据,特別是以經濟科学領域为主要对象。其次,在他們被揭露以后,他們又是互相包庇、互相掩护,企图蒙混过关。同时在展开斗争以后,也暴露出这两个右派分子在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方面,都具有异常卑鄙的野心。

由于他們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特別是有關經濟科学界的影响,系統地把他們有关經濟科学方面的論点加以揭发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他們是通过学术思想来贩卖資本主义私貨,为恢复資本主义制度鋪平道路,因而这不仅是学术思想的斗争,而且是一場严重的政治战綫上的两条路綫的斗争。

二 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 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

沈志远、吳承禧与很多右派分子不同，他們的特殊恶毒之处是在于他們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进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首先，他們对于解放以来党对科学研究领导的成績，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从而說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期統治已經沒有发展，已經过时了。1957年5月14日沈志远在上海民盟市委会召开的全体干部动员大会上大声疾呼道：“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期以来的統治，使我們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們学术界显得非常沉寂。没有任何的独立思考，听不見有什么自由辯論的空气，也就是說我們的学术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气的。”看起来这是多么冠面堂皇的文章，似乎他沈志远在为学术界沒有自由、沒有独立思考而呼吁而叹息，他还摆出一副捍卫学术自由的样子。我們的学术界真的如沈志远所詛咒的“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了嗎？恰恰相反，我們的学术界正是由于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正是由于党的領導，我們的科学文化事业获得了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繁荣，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則益見其昌盛。只要我們把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学术界作一显明的对比，就不难

看出沈志远这一发言的荒謬、他的虛伪动机和无賴的詭詐态度：

第一，学术界有没有生命和有没有生气的标志，首先而且主要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革命实践和經濟实践中的运用和創造性地发展問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领导中国革命，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方面，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指导，不但在很短的三年内恢复了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統治破坏的国民經济，而現在又提前超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这不是完全表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生命力嗎？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中曾說：“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革命和建設中的偉大生命力表現的根本总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确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原则，使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革命和經濟实践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如在我国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党中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經济、公私兼顧、劳資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提出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我国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提出“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在我国經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原則；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又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采取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以及在政治思想战綫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这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革命和建設中更加丰富更加发展的証明嗎？这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与生命力极为强烈的表現嗎？誰都看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實踐中，不但获得了充分运用和創造性地发展，且已在科学文化領域內开出了灿烂之花。但由于沈志远、吳承禧等右派分子故意否定我国革命和建設的成績，因而也抹杀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在我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實踐中所起的指导作用，并由此得出結論：“学术思想被窒息而死”。由此，他們就硬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教条主义，他們就可以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达到反馬克思列宁主义之实的目的了。你們看，在沈志远大声疾呼“学术界教条主义的长期以来的統治”的同时，吳承禧于去年5月12日在上海民建会学习輔導报告会上所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經濟的特征与一般动向”的报告中，也极尽其歪曲与侮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事。他特别是对于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周期性經濟危机与无产階級貧困化的理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把这些理論都說成是教条主义。他說：“……瓦尔加、美共中央有些經濟学家都写了許多文章，現在大都破产了，因为把帝国主义看得那么簡單，講来講去就是危机不可避免。苏联有許多同志也是如此，这是教条主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們也正在檢查这种教条主义。”又說：“……每一阶段也不是这样就可以解釋的，資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

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学者也在笑我們，說我們閉着眼睛不看事实，他們說：还繁荣得很呢。”他甚至还用了苦肉計，把自己也批評一通：“过去我写了一些小册子，也犯了教条主义，害了一些人。”这不是和沈志远异曲同工的調子嗎？这不是完全暴露了他們的真实企图，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嗎？

第二，我們再檢查一下，解放八年来的学术界，是否如沈志远所講的“没有任何的独立思考”和“听不到自由辯論的空气”呢？这当然是右派分子對我們学术界的公开侮蔑。不过我們的独立思考，与右派分子所講的独立思考有不同的解釋。我国革命和建設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因而我們的独立思考，必須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而独立思考的内容也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有利于广大人民的远大利益为目的。解放以来，三大改造、五大运动和大規模的建設运动，成績是巨大的、空前的，不仅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学术思想領域的偉大胜利。这正是由于广大人民以共产党为核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充分进行了独立思考，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才能取得了这样偉大的成績。当然右派分子所要求的独立思考是要反对以共产党为核心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的，要求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紀律，要求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自由泛濫，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他們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認為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因而認為学术界受到教条主义的統治，沒有任何独立思考。他們之所謂独立，是要向共产党鬧独立，向馬克思列宁主义鬧独立，向人民群众鬧独立

立。毫無疑問，我們對於任何人只要他們擁護以共產黨為核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我們是十分鼓勵他們獨立思考的。事實上廣大人民都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着從未有的廣泛而深入的獨立思考，但是我們對於那些向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鬧“獨立”的人是絕對不能給予他們以獨立思考的自由。誰都知道，學術界的獨立思考和民主自由一樣，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必須服從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我們絕不允許在社會主義政權下的學術界，泛濫着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獨立思考，來實現破壞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的陰謀。不可否認，我們學術界中，有一定的教條主義影響，但它不占統治地位，更說不上“長期統治”。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早在1942年的整風時期，即以反對教條主義為中心，曾經在黨內外廣泛深入地清除了教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新黨章的總綱中也明確地規定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鬥爭中從實際出發，靈活地創造性地運用它的原理解決實際鬥爭中的各種問題，並且使它們理論不斷地得到發展。因此，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体實踐密切結合的原則，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者經驗主義的偏向。”這不是很明显嗎？共產黨從來是反對教條主義的，而且把反教條主義訂在黨章內作為全黨每一個黨員的指針。沈志遠、吳承禧之流，究竟根據什麼來污蔑黨和學術界是“教條主義的長期統治”呢？

第三，右派分子說我們“沒有自由辯論的空氣”，這也是造

謠。解放以來，學術空氣一直是生動活潑和在蓬勃發展當中的。如果有人不能體會而沈志遠是應該有深切體會的。大家回憶一下：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面，許多人肚子都吃不飽，自然談不到什麼學術科學研究，而且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介紹與傳播是受禁止和壓制的，有的人還因此喪失了自由和生命。很多醉心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人，連得到一本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 B. C也是當着寶貝一樣的輾轉傳閱的，這些不是沈志遠都熟知的事情嗎？不是正由於廣大知識界具有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熱烈欲求，你沈志遠利用優越的條件編寫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書籍，才獲得“名利雙收”和“經濟學家”的地位嗎？不正是由於解放以來，學術空氣的濃厚，你編寫的書籍才獲得空前未有的銷路，你因此才成為腰纏數萬貫的富翁嗎？我們再看一看解放以來的學術界成就：首先是科學幹部隊伍的成長，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泛傳播與介紹，很多人从不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到逐步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的人原來是反對的，現在也已不反對了，到1956—1957年，我們已經有了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幹部達65,000余人。其次，是科學研究機構的擴大，在國民黨統治下面，僅有一個中央科學院和北平社會調查所，而我們現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已有研究單位14個，各業務部門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各大學也都有自己的教研室，科學研究經費如以1950年為100，1956年則為2,062，絕對數值已達到6,674萬元。而在抗日戰爭以前的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來不超過400萬元。（以上數字引自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

言)。再次,各大学普遍設立了馬列主义基础,政治經濟学,中国革命史,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門政治課。各业务部門都規定占用工作時間定时进行理論学习;还有关于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仅人民出版社一家即出版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 210 种,共計 2,796 万册,此外,还出版了 900 多万册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輔助讀物和通俗讀物。另外,在学术問題上还进行了极其广泛深入的討論,如: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关于古代史分期的爭論,中国哲学史的爭論;在經濟科学方面,我們进行討論的問題有: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經濟規律問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我国資产階級与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的性質問題,国家統一領導下的自由市場問題,定息的性質問題,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償問題,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的体系結構問題,和社会主义經濟的基本矛盾問題等等。这些討論都是生气勃勃的。单单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經濟規律問題的討論,参加討論的人,包括各个方面,仅学习杂志即收到討論文章 136 篇,发表了近 30 万字,討論時間达一年以上,这样还說听不見有什么自由辯論的空气,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嗎?当然讓他們公开販卖修正主义和資产階級唯心主义的自由辯論是听不見的;这也就是这班右派分子所以伤心叹息的根本原因吧!

第四,沈、吳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对社会科学の領導,故意說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学者专家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沒有科学研究自由。沈志远說:“自己有时也写文章,但只不过是宣傳解釋而已。”吳承禧說:“現在治学好象做考据或者做解釋工作。”为吳承禧所支持的楊蔭溥、姜庆湘等在宣傳工作会

議上的发言，攻击“几年来高等学校里教师们变成了留声机，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衙門，許多学者专家变成了鸚鵡”。照他們这样講，好象党和政府只准許他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財經政策作一些宣傳解釋工作，而不能有創造和发展。难道这些都是事实嗎？显然不是。首先，我們的財經政策，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經驗，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而制定的，制定的过程，又都是走群众路綫，经过中央、地方、各部門与广大的人民的反复討論，集中了专家学者与广大人民的意見，力求反映客观情况和客观規律的作用。正由于我們財經政策既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与广大群众的意見和切身利益相結合，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方面取得偉大的胜利。不但在設計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求發揮大家的积极性与創造性，以便集中群众的智慧，就是在貫徹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允許提意見，如果意見是正确的，在适当时期仍然可以作必要的修改。譬如說，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和发展农业綱要，不都是經過各种有关組織和群众的广泛的討論的嗎？沈志远、吳承禱都是政協委員，人民代表，不但参加过各种討論，而且有些还經過他們举手贊成通过的，难道說那些討論都是只許“宣傳解釋”，不許發揮己見的嗎？他們大概認為我們党和政府的負責人，都不是“专家学者”，所以不配起草和制訂財經政策，所制訂的財經政策，都不合科学規律，只有他們沈志远、吳承禱等才是“学者专家”才懂得科学，才配制訂財經政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沈志远、吳承禱等的真实面目，无非也是为了要求“参加設計”，这与章